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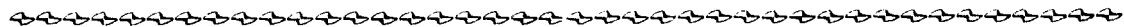
线，丰富了世界无产阶级文艺的宝库，是继巴黎公社革命诗歌、高尔基长篇小说《母亲》、马雅可夫斯基的叙事长诗《列宁》等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不灭的“炬火”。“四人帮”妄图扑灭《母亲》，《毁灭》等无产阶级文学的“炬火”，充分暴露了他们敌视、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反革命狼子野心。

革命的“炬火”，照亮了革命者前进的战斗道路。《毁灭》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法捷耶夫的《毁灭》、绥拉菲摩维支的《铁流》等苏联早期优秀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，就伴随着红军战士的足迹，飞越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一九四二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，曾克服纸张缺乏、印刷条件较差等等的困难，出版了《毁灭》和《铁流》，为干部学习提供精神食粮。全国解放后，《毁灭》、《铁流》等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的多次再版，大量发行，

在我国读者（特别是青年读者）中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作用。现在，我们仍可从中吸取鼓舞自己前进的力量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英勇战斗。

尤其应该指出的是，毛泽东同志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援引《毁灭》为例，强调《毁灭》的作用和影响，鼓励革命根据地的作家、艺术家，“和新的群众相结合”，创造“新的人物”，反映“新的世界”，树立了“洋为中用”的范例。至今它对文艺如何真实地反映四化建设，描写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人物，仍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鲁迅译印《毁灭》的战斗业绩，历历在目；鲁迅从革命斗争和创作实践的需要出发，大力扶植、热情介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的战斗精神，永远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



“达夫一生可以说不得志的一个人，在北大没有当到教授，后来（一九二四年初）同石瑛先生到武大去曾经担任过教授”。这是郭沫若同志在《历史人物·论郁达夫》中的话，提到了郁达夫赴武昌就职的时间。

冯雪峰同志在《郁达夫生平事略》（载《新文学史料》第一辑）中则说：郁达夫“一九二五年春初赴武昌任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授”。在《新文学史料》第五辑上所载的于昀同志的《创造社与郁达夫》一文中，也称：“一九二五年初，郁达夫离开北京大学，随石瑛去武昌担任武昌师范大学文科教授”。

郭说、冯说，于说这三种说法，何者准确？在三十多年来的一些研究郁达夫的论著和文学史教材中，都没有提出质疑或加以辨正，有的索性回避。

近期，笔者查找到了郁达夫的《说几句话》一文，这是为郁达夫著作的各种集子、本子所未收的散佚的一篇通信，载于《现代评论》四十六期。郁的这篇通信写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七日，内中追述到他离北京南下武昌的时间时这样说：“从今年的阴历正月起，我在武昌的狗洞里住了半年”。

经查对，一九二五年的农历正月初一，为公历的一月二十四日，农历正月半，为公历的二月七日，农历正月三十日，为公历的二月二十二日。按旧时中国人的一般习惯，农历正月半前是不离家外出工作的，更何况旧时的大学，不会在正月半前开学的。郁达夫即使因生活所迫，要早早赴任，也不会早于农历正月初九（公历二月一日）。所以郭沫若同志的说法是错的，他肯定是记错了；冯雪峰、于昀两同志的说法较接近实际。郁达夫赴武昌的确切时间，当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——二月二十二日之间。

郁达夫赴武昌的时间

唐鸿棣